蘇聯語言學的馬列主義基礎

羅姆捷夫著 鄭祖慶譯

蘇聯政府、布爾什維克黨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對於科學的成長和發展，表示着極大的關懷。根據聯共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提議，在1947年進行了關於哲學問題的討論，揭露了理論戰綫上所存在的嚴重缺點。黨和斯大林同志對於哲學問題的一些指示，確定了蘇聯社會科學今後發展的道路。1948年，在我們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确領導之下，進行了關於生物學問題的討論，在這次討論的過程中，粉碎了生物學中反動的唯心論傾向——魏斯曼學說、摩爾根學說。

1950年5月至7月，在真理報上所進行的蘇聯語言問題的自由討論，是語言科學發展中的歷史性指標。

斯大林同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論語言學的幾個問題”、“給同志們的回答”的幾篇論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語言科學中的天才貢獻。由於這些論文指明了研究馬克思主義語言科學的對象、方法、目的和任務，於是引起了語言學的真正改革，奠定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礎。蘇聯語言學的最重要的問題：如語言與上層建築問題、語言與階級問題、辭彙與語法問題、語義學與詞的構造問題、語言史與歷史辯證法問題，都在斯大林的著作中獲得了新的闡明。在論語言學的著作中，斯大林同志表明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創造性地應用在語言學方面的典型。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馬爾理論的荒謬性，這種理論給了語言科學許多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馬爾的門徒們建立了一種不適合於科學工作者的品質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語言學的領導集團對於那些稍稍批評馬爾的新學說的人，就加以壓迫和制止。真理報上進行的討論，揭露了蘇聯語言學中唯心論的缺點，把馬爾的門徒們在中央和地方所樹立的軍閥式的統治制度打得粉碎

了。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蘇聯語言學在馬爾“學說”的影響下獲得了傳播的一些原則上的錯誤。斯大林同志指出：馬爾說語言是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這就給了語言學一個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並說語言有階級性，這又給了語言學一個非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馬爾給了語言學一種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不謙虛的、目空一切的腔調，否定了語言科學中的先前的一切成就。

斯大林同志說明了馬爾語言學理論立場的缺點，指出蘇聯語言學是不能在一些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礎上得到發展的。斯大林同志指出：歷史比較法雖然有其先天上的嚴重缺點，但比起馬爾的唯心主義的四種要素的分析法還要好些。輕視語言科學的成就，證明馬爾只是一個簡單化了、庸俗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者，正如無產階級文化派和“俄國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派”一樣。

斯大林同志論語言學的一些著作，對研究社會現象的各種科學，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斯大林同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論語言學的幾個問題”、“給同志們的回答”的著作中，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科學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新的總結、新的原理，也使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更加豐富起來了。這首先是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馬克思主義觀點、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關係間的辯證法，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法則以及關於它在各種社會經濟體系中的特有現象，特別是它在社會主義時代特有的現象。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及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完成問題，闡明了共產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問題，闡明了與共產主義建設任務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發展問題。

斯大林同志豐富和發展了關於上層建築的社會現象，關於藝術、文學、法律、道德等的作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

斯大林同志更進一步發展了革命的辯證法；他指出：從舊的質過渡到新的質的過程中，可能不是突變，而是飛躍。這一原理，對於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法則的了解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從舊的質過渡到新的質經過突變的法則，只有在敵對階級的社會裏才有它的必要性，而對於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這個必要性的。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法不能視為教條，對於那些書呆子和死啃書本的人，要堅決地打擊他們，因為他們不了解生動的創造性的富有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

斯大林同志的新著，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斯大林同志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語言與思維統一的原理，指出人類語言與思維之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與相互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其新著中，揭露了煩瑣哲學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庸俗化的一切毒素，使語言學中的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同時，也使那些形式地引證着馬克思主義的話卻沒有體會問題本質的人們，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斯大林同志論語言學問題的著作，成為最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寶庫。

* * *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所謂馬爾關於語言的“新學說”，這種學說在語言學領域內無恥地曲解了馬克思主義。

馬爾認為語言和文化是一致的，語言和思想是一致的，他主張語言是經濟基礎上說話的上層建築，正如上層建築替一定的基礎服務一樣，當社會從這一基礎過渡到另一基礎時，這一上層建築就被新的上層建築所代替。語言也只是反映和替某一經濟基礎服務而已。經濟基礎的交替，也隨着語言及其語法構造的交替而來。

依照馬爾的意見，原始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產生了一種無定型的語言體系，但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卻產生了語尾變化的語言體系。這就是說：在原始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中，對於生產手段沒有私人的佔有。因此，也就確定了人與人之間對於生產工具的關係也是平等的，而適

應這樣經濟基礎的語言的語法構造，在詞中沒有補助語和非補助語的小品詞；但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中，就產生了生產手段的私人佔有，同時也確定了人與人之間對於生產工具關係的參差與不平等，於是又產生了適應這樣社會的語言結構。在這種語言結構裏，詞中出現了補助語和非補助語的品詞。隨着社會經濟基礎從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而語言也由一種語法構造過渡到另一種語法構造。馬爾把這種隨着經濟基礎的交替而交替的語言結構，稱為語言發展的階段。這種語言發展的階段論，是以語言作為上層建築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為依據的。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這種“學說”的缺點，同時指出語言不是一種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以政治、法律、美學和其他的觀念替社會服務，並且替社會創造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制度”（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國家政治出版局，1950年版第36頁，解放社版中譯本第40頁）。每一種經濟基礎，都有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當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那末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變化，隨着被消滅。當產生新的基礎時，那末也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

在這方面，語言與上層建築是根本不同的。”（同書第6頁，解放社版第2頁）

語言的基本詞彙及其語法構造，不是隨着一個基礎為另外一個基礎所代替而變化。上層建築是同一經濟基礎存在着和活動着的一個時代的產物，而語言却不是一個時代，一個經濟基礎的產物。相反的，它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這許多時代裏，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語言的生命比任何一個基礎，任何一個上層建築的生命都長久得無比。“不僅一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而且好幾個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產生與消滅，也不會使得在歷史上消滅一種語言，消滅語言的結構和產生具有新的詞彙和新的語法構造的新的語言。”（同書第9頁，解放社版第6頁）

因此，語言及其構造不能視為某一種時代的產物，它的結構，它的語法構造與基本詞彙是許多時代中不斷發展起來的產物。

上層建築在思想上，政治上替社會服務，而“語言之替社會服務，乃是作為人們交際的工具，作為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為人們互相了解，

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這一切活動範圍，包括生產的領域，也包括經濟關係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會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同書第36頁，解放社版第40頁）

斯大林同志懇切地表明不能把語言與思想，語言與文化視為同一，語言不會是階級現象。上層建築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不是漠不關心的，而語言正表示對階級的漠不關心。語言不是一個基礎和一個階級所產生，而是社會歷史的全部過程及基礎歷史的全部過程所產生。語言是千百年來全部社會、社會的一切階級，幾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不是一個階級的遺產，它的創造是爲了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全社會一切階級的需要。它是一種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全體組成員是共同的全民語言。斯大林同志說：“這就是爲甚麼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替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可以替舊基礎服務，也可以替新基礎服務；可以替剝削者服務，也可替被剝削者服務。”（同書第8頁，解放社版第4頁）

斯大林教導我們：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不能組織和協調生產，社會也不能繼續存在。斯大林同志說：“在這個意義上，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同書第23頁，解放社版第23頁）

馬爾的門徒們，曾用各種方法強調語言作爲階級鬥爭工具的作用，同時曲解語言作爲社會中人們交際工具的真實性。語言是所有社會活動範圍中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當語言離開全民的立場而變成某一社會集團的同行語時，那麼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質，終止了它在社會中作爲所有人們交際工具的作用，同時注定了自己衰頹與死亡的命運。

語言是交際的工具，是一種手段。由於它的幫助，組成了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適應了民族文化和社會制度活動等的需要。所以領導民族的統治上層，散佈一種民族的壓迫制度，壓制廣大人民羣衆的本國語言。語言實際上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因此，自由發展本國語言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社會進步就不可能。正因爲這

樣，布爾什維克黨經常高高地執着這面鬥爭的旗幟，爭取本國語言的權利，爭取作爲全民語言的本國語言在文學上的自由發展。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是交際工具，是全社會的遺產之學說；關於語言是許多時代裏所豐富起來，所完善起來的產物之學說；關於語言是全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之學說，對語言科學具有原則性的意義。語言學不是古董知識的蒐集，而是一種有作用的科學——語言的發展、語言的成長和改進、社會主義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前一階段之民族語言的繁榮、民族語言的融合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後一階段世界統一語言的形成之一種有作用的科學。

布爾什維克黨和斯大林同志不是偶然地引起蘇維埃社會人士對語言科學的注意。語言科學應用以解決關係着社會生活的、關係着蘇維埃社會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關係着社會主義民族語言的繁榮的、關係着俄語——一種世界進步的語言；人類的天才者列寧，卓越的科學大師、所有進步人類的偉大領袖斯大林，以這種語言寫了他們的著作——對全世界歷史的作用之最重要問題。

作爲交際工具的語言，表現出它對各個階級是漠不關心的，但是階級對於語言却不是漠不關心的。階級影響着語言，把自己的特別的詞和語，搬到語言中去。他們極力把自己特別的術語，特別的用語灌注到語言中去。在這方面，那些脫離人民並且仇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的上層份子等表現得特別厲害，他們創造了它的階級同行語、雅語，他們極力偽稱自己階級同行語爲民族的語言。

可是階級的同行語不是語言，它沒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這些同行語只是在某一階級上層份子的狹窄範圍中通用，而不是整個社會人們的交際工具。它們本身只包含一些適合貴族式資產階級上層份子趣味的特別的詞，一些特別風雅的用語和詞句，以及一些外來語。同行語的一切主要的東西，都是從民族語言中取得的。

有產階級的上層，極力想把自己專門的詞和語，搬到語言中來，對於個別的詞灌輸着自己階級的意義論。可是這些專門的詞和語也同樣地如在意義上的差異一樣，不能破壞統一全民的語言的

共同性語義上具有階級陰影的專門的詞和語，在語言中非常之少，絕大多數的詞和語正如他的意義一樣，對於社會所有階級是共同的。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專門的詞和語的存在，以及語言在語義上的差別，並不是否定統一的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而是證實全民語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同書第41頁，解放社版第46頁）

這樣說來，語言不是階級的現象。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是全民的遺產。可是馬爾認為語言與觀念形態是同一的東西，主張語言從階級的發生時起，就是階級的現象。

馬爾認為最初的言語是手勢的，人們用“手勢說話”，用“直綫運動”——身勢——的方法思維。“手勢言語”和“手勢思維”似乎完全滿足了原始人類的需要。經濟的發展、剩餘生產物、巫師和占星家的出現，帶來了巫師和占星家所創造的有聲言語。這種言語好像能寫能讀的東西一樣，最初就有階級性的，因為它是為了滿足巫師的需要而發生，並在人民之中傳播起來，排斥了手勢的語言。

馬爾描寫由手勢語言過渡到有聲語言，是用質的飛躍形態，是用突變形態。馬爾認為所有語言一切的詞是一種創造過程的產物，是由四個根本的語言要素 *сип, бер, йон, рош*，所組成，這些要素與它所有的有聲變異現在還存在於世界的所有語言中，因為按馬爾的說法，世界所有語言只能用四種要素去處理，並開始它的發展。

馬爾關於語言起源于四種要素，關於語言萌芽於巫師集團間交往的學說，是根本不正確的、錯誤的。當然，在最初，詞彙是非常貧乏的，語法構造是原始的。可是、如果以為詞彙過去即被四種要素所限制，這些要素在世界一切語言中現在仍舊保存着，並可以在任何現代語言的每一字裡解剖出四種要素來，那就陷入了神祕之說，並與馬克思主義脫節。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在勞動活動過程中，在交際存在需要的時候，語言發生了，並成為社會上人們的交際工具。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進步的力量之一。”（同書第46頁，解放社版第52頁）所以

馬爾關於有聲語言的巫術起源和語言由巫師所創造的學說，與馬克思主義沒有什麼共同之點。

馬爾把語言階級性的論據，搬到民族語言上來。他以為：民族語言是資產階級文化的一部份，是產生於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照馬爾的說法，民族語言不是全民的語言，而是資產階級的語言，正如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一樣，資產階級的階級語言代表着全民族的語言一樣。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語言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它以逐漸改進的方法變化着。語言不是一個階級的遺產，而是全民的遺產。語言的使命不是為一個階級服務，而是為全社會服務、為所有的階級服務。斯大林同志寫道：“至於語言的繼續發展，從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從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從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在所有這一切階段上，作為人民在社會中交際工具的語言是全社會統一的、共同的，是對社會所有組成員同樣服務的，而不管他們社會的地位怎樣。”（同書第12頁，解放社版第10頁）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民族語言問題的了解給了不少的啟發。民族語言不是像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上層建築那樣在資本主義時代重新創立起來的，而是許多部族語言的繼續發展。民族語言不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產物，也不是僅僅服務於資產階級，而是許多世紀發展起來的產物，服務於資產階級全社會的。民族語言的共同性，不是限於資本主義社會教育領域內的局部共同性，而是全民族的共同性。在資本主義戰勝了封建主義的時代，民族形成了，而部族語言便上升到民族語言的階段。

部族語言發展為民族語言，是以本國語的各種方言，與本國語的某一方言之交接、集中、最後融合的方法產生的。例如，俄羅斯民族語言在庫爾斯克·奧勒爾方言的基礎上形成了，而烏克蘭民族語言則在波耳多瓦·基輔方言的基礎上形成了。因此民族語言不是資產階級的或階級文化的特殊語言，而是經過封建割據的消滅和民族市場的形成以後所革新起來的原來本國語言，這就是說上升到民族語言階段的本國語言。

馬爾一方面把民族語言當作資產階級文化的一部份，當作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資產階級上層建

策：另一方面，他錯誤地認為資產階級同行語代表民族語言。這種政治策略的反動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以為方言習慣語和同行語能發展為獨立的語言，能够排擠民族語言並代替民族語言，這就是喪失歷史前途和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同書第14頁，解放社版第12頁）

馬爾論語言“學說”的代表們，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主張資本主義時代民族語言的共同性不是全民的，而是階級的，因此，問題也好像在於把民族語言的階級共同性變成全民的共同性。這些含混的措詞，不過是表示承認資產階級的階級同行語為民族語言，要求以資產階級同行語來驅除並代替民族語言。

斯大林同志揭露這些論據的反科學性，他指出貴族或上層資產階級的階級同行語，既沒有自己的基本詞彙，也沒有自己的文法構造。這些同行語“只是全民的民族語言的支派，不成其為獨立的語言，並且是注定不能發展的。”（同書第14頁，解放社版第12頁）

“語言新學說”的代表們，主張人民的本國語言不能是民族的，因為共同性不適合於人民的本國語言，人民的本國語言是被分為許多方言。但是盡人皆知，人民語言中方言的存在並不破壞語言的共同性。斯大林同志強調部族語言有全部族的共同性，因為部族語言是組成一定部族人們的交際工具。斯大林同志說：“當然，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和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佔着統治地位，並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

“往後，資本主義出現，消滅了封建的分割，組成了民族的市場，於是部族就變成民族，而部族的語言，就變為民族的語言。”（同書第13頁，解放社版第11頁）

人民的俚語與階級的同行語有着原則上的不同，人民的俚語不是一個時代的產物，而是許多世紀發展的結果。本國語言的人民方言具有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它們不是為貴族或上層資產階級服務，而是為廣大人民羣衆服務。其中一些在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能集中成為一種民族語言。地方人民俚語特點的存在，並不破壞部族或民族本國語言的統一，並不破壞其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的統一。

斯大林論研究語言的語法構造和詞彙的一些原理，在馬克思主義語言科學的發展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在語言的詞彙裏分泌其基本詞彙，並研究語言的基本詞彙與一般詞彙的關係，是非常有意義的。斯大林鄭重指出：語言中所有的詞，構成語言的詞彙。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語言的詞彙中的主要東西就是基本詞彙。其中包括所有的基本的詞，成為基本詞彙的核心。基本詞彙是比語言的詞彙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時期中生存着，並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詞彙反映着語言發展的狀態，詞彙越豐富，越紛繁，那末，語言也就越豐富，越發展。”（同書第23頁，解放社版第23頁）

斯大林同志這些指示，指引語言學家們注意研究俄羅斯語言的基本詞彙。可是俄語課程却往往不大研究基本詞彙。外來語、教堂斯拉夫字，縮寫字，都會有人研究過，而對基本詞彙却不加過問。在語言學的作品裏，往往過高地估計了革新的意義。新的時代，在語言的發展上，很少有新詞的材料不斷出現。不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期內，俄語詞彙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必須加以廣泛的研究，但我們却無權說到十月革命後是俄語發展中之品質上的新階段。

斯大林同志指出：從普希金逝世以來的長時期中，在俄國會消滅了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並產生了社會主義制度，俄國語言並沒有遭受甚麼破壞，並且現代俄國語言，按照它的結構來說，是與普希金的語言很少差別的。

在這個時期中，增加了俄國語言的詞彙。有很大一批陳舊了的詞從詞彙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詞的意義改變了，語法的某些成分也改進了。但是普希金時代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幾乎完全被保存下來。並且是現代俄國語言的基礎。由此可見，馬爾主張十月革命後的俄國語言是俄語發展中之品質上的新階段，是根本不正確的。

可是必須注意：十月革命後，俄國語言詞彙的革新對俄國語言的歷史具有重大的意義。必須記住：這些詞彙的變化，是發生於社會主義思想統治的條件下。因為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實現了我們祖國社會主義的革新，所以在語言中便確定了社會主義的思想。這些社會主義的思想表明了

俄國語言的豐富。

若干詞在語義上發生了特別巨大的變化，例如“勞動”(Труд)一詞，在過去沙俄時代，對於勞動大眾不可避免地會與困難、恥辱的包袱聯繫起來，而現在，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勞動”一詞，却與英勇、光榮、榮譽、英雄氣概的一些概念發生關係。

現代俄語中詞彙意義的變化，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顯明例證。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在十月革命後，俄國語言的發展，是密切地聯系着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但這些變化沒有破壞俄國語言的基本詞彙及其語法構造，因此，這些變化，在俄國語言的發展上，並不形成品質上的新階段。

* * *

斯大林同志在其論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使蘇聯語言學者，注意到研究語法的必要性。

馬爾認為研究語法只是空洞的形式主義，而那些認為語法是語言基礎的人，是形式主義者。斯大林同志表示：語言的語法構造及其基本詞彙構成了語言的基礎和它的特殊本質。

語言的詞彙還不成為語言，它只是語言的材料。“但是當語言的詞彙接受了語言語法的支配的時候，就會有極大的意義。語法規定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這樣就使語言具有一種有條有理的可理解的性質。語法（詞形變化法、造句法、）是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的綜合。由此可見，由於有了語法，就使語言有可能賦與人的思想以物質的語言的外壳。”（同書第23—24頁，解放社版第24頁）

在語言學的讀物中，以前流行着的語法形態是具體的詞間或具體事物間關係表現的概念。斯大林同志指出這種概念的錯誤。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語法科學建立着沒有任何具體性的詞的變化之一般定律。語法科學把某種具體句子加以抽象化，給以造句的方法。這是指一般的句子，是與某個句子的具體形式無關的。語法把詞和句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體內容；語法研究詞的變化和用詞造句的基本共同點。語法的定律是人類思維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類思維所得巨大成功的指標。

正如幾何學上的定理是把具體對象加以抽象化，把各種對象看成沒有具體性的物體，並在決定

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時候，當成一般沒有任何具體性的物體間的相互關係。而語法的定律也是把具體的詞和句加以抽象化，就是指詞和句的一般聯結和關係，而不是其特定的具體性。

斯大林同志指出：語言與思維有直接的聯系，但不能認為它與思維是同一東西。“語言是直接與思維聯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為可能的了。”（同書第22頁，解放社版22—23頁）所以語言不是思維，而是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鞏固下來。

為了說明斯大林同志這些原理，可以舉出下面一個例子：“知”(Знать)和“知識”(Знание)兩字在現代語言中，是表示智力的活動、認識。原來這兩字是指“工作的能力”。俄文“智者”(Знахарь)一詞正指明了這點，原來這個字是指技師，也就是指一定行業的名手，希臘文“智者”(гностор)一詞，由同一字根構成、同樣有技師——一定行業的名手——的意義。俄文“知”(Знать)字，在古代不僅表示“知”，而且表示“完成任務”。因此，人在實際活動過程中認識活動的成果，就在“知”(Знать)和“知識”(Знание)兩字中鞏固下來。

這與其他許多例子一樣，顯示着斯大林同志論語言是記載和鞏固思維活動結果的結論，是多麼地深刻。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思維與語言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沒有語言的材料，沒有語言的外壳，思想是不能在人的腦子裏以赤裸裸的形態產生的。只有在語言材料的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思想。斯大林同志鄭重指出：“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馬克思）思想的真實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只有唯心論者才能談到與語言的‘自然物質’不相聯系的思維，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維。”（同書第39頁，解放社版第44頁）

斯大林同志表示：馬爾過高地估計了語義學的價值，將思維與語言分割開來，把語言從語言的“自然物質”下解放出來，陷入了唯心論的泥潭。

斯大林同志在其論語言學的著作中，建立了語言發展內部法則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資產階級的語言學，把語言與社會分割開來，認為它是一種獨立的現象。可是馬克思早已鄭重指出：語言不是獨立的王國，它是社會現象的一種，密切地聯系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

斯大林同志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思的這些啓示，確定了語言是按其內部發展規律變化着，豐富着，改進着。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馬爾提出的、把“融合論”當作語言發展規律的錯誤，因為這種理論不能解釋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馬爾把語言當作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把融合當作語言發展規律的學說，是與語言發展內部規律的研究不相容的，因為作為說話的上層建築的語言，（照馬爾的說法）其發展是用融合的方法，不能有內部規律。

斯大林同志所創建的馬克思主義語言本質的觀點，是發生於把語言當作千百年來社會發展產物的交際工具看。語言在其整個歷史發展中，不管社會上基礎的交替如何，經常保持着它的統一和世世相承。語言有其內部發展規律，因為它的變化不是作為一種上層建築與社會上基礎的交替相聯系的，而是當作一種社會現象，與社會活動的各方面相聯系着。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語言從舊的質過渡到新的質，不是用廢除、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新質要素的逐漸積累，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的方法。新質要素的逐漸積累不是破壞、消滅現存語言的現行規律，而是讓語言發展的新規律逐漸形成。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不是永恒的、不變的，語言發展的某些規律會逐漸為其他的發展規律所代替，可是這種代替不是一方面廢止這種規律的作用，同時便開始另一種規律的作用，而是構成新規律的新質現象的逐漸積累，也就是從屬於舊規律的舊質現象的逐漸衰亡。這樣，舊規律逐漸地受着損害，失去了它的作用。

我們可以拿已經成為俄語詞彙的外來語的改造，作為語言發展內部規律作用的例子。“俱樂部”（клуб）一字原是從英語借用來的，可是現在它和俄語同樣地變化，同樣地使用。照英語的法則，名詞沒有格的變化，英語俱樂部（club）一字也是不變格的。可是照俄語法則，名詞有格的變化。正因如此，所以來自英語的“俱樂部”（клуб）一字，便像俄國固有語“家”（дом）一字同樣地變化。不少借用

字如“紙張”（бумага）（出自伊朗）“大魚網”（невод）（出自芬蘭）等大量地滲入到俄語的組織中，服從俄語的內部規律，完全失掉了非俄語字的形態。

許多外來字依照俄語法則形成了新字。例如：“文化”（культура）（源出拉丁語）一語，依照俄語的規則，造成了新字“文化的”（культурый），如同從俄國固有語“人民”（народ）一字造成“人民的”（народный）新字等情形一樣。

斯大林同志鄭重指出：由於他種語言詞彙的加入，當然豐富了俄語的詞彙，對於這點非但沒有削弱俄語，反而加強了俄語。

由此看來，若干語言經過融合的結果，並不形成一種具備着自己內部發展規律之品質上的新語。兩種語言融合時，通常總是其中一種語言勝利，保存着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繼續按其內部發展規律改進着。斯大林同志指出：俄國語言便是這樣的，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與好幾個民族的語言融合，並且經常成了勝利者。

這是不是說，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代，語言的發展將是一種語言的勝利和另一種語言的失敗？不，不是這樣說的。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後，我們將遇到的不是兩種語言——其中一種遭受失敗而另一種成為鬥爭中的勝利者，而是好幾百種民族語言——這些語言由於各個民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長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豐富的單一的區域性的語言，然後區域性的語言才溶合為一個共同的國際語言。這種語言，當然既不會是德國語言，也不會是俄國語言，更不會是英國語言，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語言和各區域語言的精華的新語言。”（同書第53——54頁，解放社版第61頁）

* * *

在斯大林同志的天才指示和總結的基礎上來發展蘇聯的語言科學，乃是高等學校裏掌握知識寶庫的蘇聯青年的偉大幸福和無上光榮。

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沒有先前語言科學成就的紀錄，是不能建立並發展起來的。在馬列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來改造這些成就，並以偉大的斯大林時代可寶貴的新的成就、新的總結、新的分析來豐富語言科學，是擺在青年們面前從事語言科學研究的重大任務。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是作為科學的語言學之主要任務。

我們年青的學者們，應該從斯大林同志這一指示出發，研究語言科學的根本問題，研究語言在其發展全部過程中的形成、成長和改進的問題。

如果現代語言是許多時代的產物，是許多世紀發展過程中不斷改進積累的結果，那麼脫離了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的歷史形成過程，脫離了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是不能研究它的。在這一方面，語言學的課程有着嚴重的缺陷。舉例來說，現代俄語課程對個別事實特別注意（如對品詞、格等的定義），却完全忽略了作為發展和鬥爭工具的現代俄語的歷史構成的解釋，忽略了語言各別現象的歷史闡明，忽略了這些現象在現代俄語體系中的地位。

在俄語語法史課程的構成裏，也存在着若干原則上的錯誤。由於整個史前部份的排除，同時又把個別斯拉夫語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的基礎形成之許多時期。從課程裏刪去，語法史課程便大大地失去了它的科學意義。像這樣語言史課程的構成，是與斯大林同志論語言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它的語法構造和詞彙的基礎是建立於遠古時代的基礎上之指示大相抵觸的。

斯大林同志論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作為語言學主要任務的指示，要求根本改變大學生和研究生論文的主題，要求克服對語言現象靜止的

記述態度，要求把那些可能提供研究語言現象在其發展過程中具有語言內部規律的東西提到前列。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要求完全消滅用馬爾的按照四種要素的分析法來研究語言現象。歷史比較法雖然有其嚴重缺點，但是作為研究語言現象的專門工具，歷史比較法仍是必須利用的。

斯大林同志表示：歷史比較法“推動着研究語言的工作”，而四種要素的分析法“只是要躺着，環繞着鼎鼎大名的四種要素去作無意義的推敲猜想而已”。

蘇維埃社會將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對於這點不但需要創造物質的技術條件，而且應在原有的科學軌道上。提出了改進語言的問題，提出了研究偉大的俄語及其在社會主義的民族語言發展中的作用問題。語言科學應用以解決蘇維埃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這一切，就是青年幹部們的光榮任務和重大責任。

斯大林同志論語言學問題的思想泉源，是無窮盡的。斯大林同志論語言科學問題的著作，奠定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礎。

堅決遵循斯大林同志的主要指示，使蘇聯語言學走上了康莊大道，使蘇聯語言學能够在世界語言學中佔得第一位。

〔譯自“Молодой Большевик”，1950年9月號
17期，8—20頁〕

東北科學研究所試驗土壤水泥築牆法成功

東北科學研究所最近研究出用土壤水泥築牆壁的辦法。這種辦法如在目前大規模建築單層房屋和職工宿舍時被廣泛應用，可以節省很多的經費和勞動力。

這種土壤水泥是用水、水泥和土壤按一定比例配合而成的，過去通常是用來修建荷重較輕的各種工程如輕便道路等。去年二月，東北科學研究所開始研究用這種土壤水泥建築的牆壁來代替一般用的磚牆，經過實驗，他們發現在土壤中加入7%的水泥最為適宜。他們實驗了兩種建築方法：一種叫做“土壤水泥築牆”，是把木製模框裝在牆基上，然後把配好的土壤水泥灌進框內，搗築結實後拆卸模框，再繼續向上裝框、搗築。另一種叫做“土壤水泥坯牆”是把土壤水泥做成坯狀，再一塊塊地砌起來。試驗結果，“土壤水泥築牆”的工料費用約為同樣厚的磚牆的31.7%，而“土壤水泥坯牆”的工料費用約為同樣厚的磚牆45.1%；而土壤水泥築牆比坯牆更為經濟，因為這種築法可以不需要技術熟練的瓦工，只要把普通的小工稍加訓練就可以。

用土壤水泥築成或砌成的單層房屋的牆壁有足够的強度，能耐雨雪浸蝕，不易發生裂縫和表面剝落的現象。土壤水泥中的土壤可就地取材，省工省錢。尤其是磚、石、砂子不足和勞動力缺乏的地方，用土壤水泥是最經濟的建築方法。

（新華社稿 1月13日）